

審美觀·觀念行動·跨文化闡釋：

碑學脈絡中的周作人

陳 玲 玲^{*}

摘 要

清季以來考古學、碑學的不斷興盛，使得書法取法對象不斷擴大，最終改變了千年以來帖學一統天下的格局。晚清以降，西方人和日本人參與了中國的考古活動，和對中國美術史的撰寫，他們把美術的範疇從原來的書法、繪畫擴展到了金石學領域，以及 20 世紀前後發現的西北簡牘和敦煌經卷，從而改變了民國以來中國知識人對美術的理解。本論文把周作人放在清季以來碑學的發展脈絡中，梳理他的訪碑、校碑工作和藏鑑金石拓片的日常生活，檢視他與朋儕間的金石、書畫往來，在碑學譜系中重構他與晚明文人的親和關係，並且以淪陷時期周作人與碑學譜系的關聯性，探討他的傳統觀以及出處進退的態度，來闡明文類雜糅的周作人其思想與審美觀形成的源頭，同時指出以跨文化闡釋為路徑來詮釋周作人及其同時代人的必要性。

關鍵詞：碑學、周作人、五四運動、復古主義、文類雜糅

* 作者現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Aesthetics, Action, Interpretation:

Zhou Zuoren in the Genealogy of the Tablet School

Lingling Chen^{*}

Abstract

Since Qing dynasty, archaeology and tablet calligraphy has been keeping flourishing, which expands the subjects of calligraphy, and finally changes the pattern that was unified by hardwood calligraphy.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sterners and Japanese participate in the Chinese archaeological activity and write Chinese art history, expanding the field of art history from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o epigraphy, bamboo slips and Dunhuang Scriptures, and thus change Chinese intellectuals' views of the art. This paper places Zhou Zuoren's activit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development vein of the tablet calligraphy, to present his rubbings changing and purchasing and site visiting to steles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Zuoren and literati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explores Zhou's view of the tradition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the collaboration by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and the genealogy of the tablet school in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so

^{*} Researcher, Culture Institute of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s to reveal the origin of his thinking and aesthetic ideas.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Zhou Zuoren and his contemporaries.

Keywords: tablet school, Zhou Zuoren,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doctrine of “back to the ancients,” genre blending

審美觀·觀念行動·跨文化闡釋：

碑學脈絡中的周作人^{*}

陳 玲 玲

一、問題的提出：從碑學初興談起¹

清初以降，考據學興盛，而考古學、地質學、人類學等領域的成果又增益了考據學所依憑的資料，於是以考古發掘的文獻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的「二重證據法」開始運用。² 比如，清季學者、文人間出現了訪碑、收藏碑拓、研究金石文字的動向，而碑碣印璽本來就通於書法，考古及二重證據法的實踐對書法界的影響是：書法的取法對象不斷擴大，從乾嘉時期的漢魏六朝的碑版、墓誌、造像，擴展

*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近代以來中日文學關係研究與文獻整理」（項目批准號：17ZDA277），及北京社會科學院一般項目「民國北京文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¹ 碑學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碑學，指的是晚清以來取法北魏碑版的書法；廣義的碑學，是指清初以降取法二王體系之外的金石文字。本論文取碑學的廣義概念。

² 此「二重證據法」由王國維（1877-1927）提出，其完整表述是：「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見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

到了道咸時期碑版摩崖、鐘鼎彝器、錢幣、鏡銘、璽印、陶文、瓦當、磚文等，再擴展到一千九百年左右所謂學術最大發現之殷墟甲骨文、敦煌經卷、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簡牘、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取法對象的改變促生了書法新的技法和審美追求，書體從乾嘉時期以篆、隸的復興為先導，發展到道咸時期楷、行、草風格之改變，再到民國時期寫經體在知識菁英圈子內的流行，碑派書法由此誕生並逐漸興盛，打破了 1000 多年以來帖學一統天下的格局。在書法理論方面，嘉慶中期，阮元（1764-1849）通過考證梳理大量金石文獻，作《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挖掘整理出了與帖學相對的北朝書法，並且對其大力提倡，發出了尊碑抑帖的先聲。道光年間，包世臣（1775-1855）所著《藝舟雙楫》刊行，其中論書部分追溯了漢代以來書法用筆源流，推崇魏碑，建立了筆墨新體系，對後世影響深遠。後來的康有為（1858-1927）正是在《藝舟雙楫》的基礎之上，作了《廣藝舟雙楫》，並在其中評價道：

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
大啟祕藏，著為《安吳論書》，表新碑，宣筆法，於是此學如
日中天。迄於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
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³

《藝舟雙楫》除了因提倡碑學、建立筆墨新體系而備受矚目之外，它的另一個貢獻還在於將「藝」的雙楫設定為「文」與「書」，有形地呈現了「文」、「書」結合的理想文人生活形態，對清代以降很長一段時間金石考證偏重經史、排斥藝文的傾向有所糾正。《藝舟雙楫》這種體裁設置，將書藝擴展到文人品第，暗含著文章、書法相匹配才是理想文人的價值判斷。

康有為在 1888 年上書失敗、政治抱負不得施展的情況下，迅速

³ 潘運告編注：《晚清書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 年），頁 202。

轉向碑學研究。他借助書法的微言大義來求政治之變，逾一年即完成了被譽為清代碑學理論巔峰之作的《廣藝舟雙楫》（1889）。該著首次提出「碑學」、「帖學」概念，獨尊魏碑，否定唐楷經典審美範式，並且將帖學貼上守舊、類古文經學等標籤，與開新求變、類今文經學的碑學相對立。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康有為流亡日本，他的《廣藝舟雙楫》也傳到了日本。當時留學早稻田大學的錢玄同（1887-1939）買到了它。錢氏在日記裡記載：「上午至神田，購得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及《大義覺迷錄》兩書。……歸，閱《雙楫》，內述隸宗漢，碑宗六朝及隋，而卑唐以下。甚好。」⁴自1908年夏，章太炎（1869-1936）在東京的《民報》社為周氏兄弟（周樹人〔魯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許壽裳（1883-1948）、朱希祖（1879-1944）、錢玄同等單獨開設講座，講解《說文解字》，章太炎門下弟子也自此交契日深。同時授業於章太炎的朱希祖也注意到了流入日本的國內碑學名著，他記載自己「至上野帝國圖書館特別室，觀《安吳四種》中《藝舟雙楫·論書》一卷」。⁵而朱希祖第一次見到武梁祠、雲岡佛像等影像資料，以及罕見的金石書，則是在錢稻孫（1887-1966）家。⁶故可推測，以他們之間的親密程度和交往方式而言，這一批留日生在汲取西學和日本學問的同時，他們共享中國傳統經典，包括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碑學。1914年，日本美術家中村不折（1866-1943）和井土靈山（1859-1935）將康著譯成日文，名為《六朝書道論》，由二松堂出版，到1927年康有為逝世已經翻印11版。事實上1880年楊守敬（1839-1915）赴日，帶有歷代碑版、法帖10000多件，由此在日本書界颯起以篆隸書和碑學構成的一股旋風，碑學就跟隨著他傳入了日

⁴ 錢玄同著，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52。

⁵ 朱希祖著，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79，「1908年7月19日」。

⁶ 朱希祖著，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上冊，頁90-91，「1913年2月11日」。

本，日下部鳴鶴（1838-1922）、內藤湖南（1866-1934）、長尾雨山（長尾甲，1864-1942）等學者在汲取中國碑學理論的同時，從東洋學視角來考證書法。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不可能不受這股旋風的影響，故他們閱讀碑學著作並非出人意料之舉。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中國的「古籍、書畫、金石、碑帖拓本等大量文物傳到日本，彼時形成了如三井等財閥系收藏家。此外，大正到昭和期間出現了新的中國書畫收藏家，主要有政客、商人、文人學者和美術家等」，「碑學是從近代之前到近代（作者按：尊重傳統中國思想的）延續的過程中逐漸被接受的。在書家、學者和漢學家等群體中，作為最新的學術知識受到了熱烈的歡迎」。⁷ 日本的中國美術史家，如大村西崖（1868-1927）等所撰寫的中國美術史改變了對美術的認知，由原來的書畫擴展到了金石範疇，這些美術史著作又形塑了民國知識人的美術觀，這在周氏兄弟身上體現得尤為分明。

留學時期的周氏兄弟並沒有留下閱讀碑學的文字，但是據周作人晚年的回憶，少年時代的魯迅就關注羅振玉（1866-1940）的著作：「富晉書莊價錢奇貴，他最害怕，只有要買羅振玉所印的書的時候，不得已才去一趟，那些書也貴得很，但那是定價本來貴，不能怪書店老闆的了。」⁸ 進入民國，政治思想已然落後的康有為在碑學上的影響日隆：碑學不僅成為顯學，也成了被菁英知識人普遍接受的一般學問，它改變了民國藝術的整個生態。碩學通儒沈曾植（1850-1922）早年精研帖學，中年學包世臣，由帖入碑，進入民國之後始取法敦煌經卷、流沙墜簡，冶為一爐，完成了衰年變法。被譽為「帖學之魂」的沈尹默（1883-1971），因受陳獨秀（1879-1942）批評其字「俗在骨」，⁹ 於是在研讀《藝舟雙楫》的基礎上，反覆臨摹《龍門二十品》、《鄭文

⁷ 佐佐木佑記，程俊英譯：〈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在日本的接受和影響——以中村不折為中心〉，《中國書法》2019年第2期，頁73-74、74。

⁸ 周作人：〈老長班〉，收於周作人著，止庵校訂：《魯迅的故家》（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頁366。

⁹ 沈尹默：《沈尹默書法論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154。

公碑》、《爨龍顏碑》等大量魏碑及墓誌，碑帖兼修，方成一代大書家。此外，如于右任（1879-1964）、李叔同（弘一法師，1880-1942）、馬一浮（1883-1967）等，無不在碑學的滋養中形成了各自的書風。而金石學對吳昌碩（1844-1927）的書、畫、印的影響更是顯見。民國之後的周氏兄弟正是在濃厚的碑學氛圍中，幾乎同時做起了鑑藏、抄錄和輯校古碑的工作，在北京、紹興之間彼此頻繁地互寄碑拓、金石文字。兄弟失和之後，二人互為參商，魯迅繼續在輯校古碑之路上前行，這在《魯迅的書法藝術》一書中有詳細的論述，¹⁰ 本文不再贅述。至於周作人，他輯校古碑的工作比魯迅更早；直到2010年，始有研究者對周作人這一時期的工作做大致的整理，¹¹ 但缺乏進一步的闡釋。1917年4月，到北京之後，周氏與清季以來碑學脈絡裡的人及其審美趣味、文化品格的關聯，也都因為線索的隱蔽和凌亂而缺乏系統的整理研究。筆者發現，如果把周作人放在碑學的發展脈絡中，梳理他與碑學人物系譜的關聯，不僅可以追溯周氏審美趣味形成的根源，也可以窺見關聯性背後周氏的歷史觀和思想形成的路徑。故此，筆者將沿著先行研究所提供的草蛇灰線，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二、收藏碑拓、輯校碑刻：「向下滲」的地方性知識

1912年，民國初立，政治和人心不穩，社會失範。「革命成功以後，大家的精神才力都注重到政治方面，對於思想文化無人注意」。¹² 然而，剛從日本回紹興的周作人，卻「一直躲在家裡，雖是遇著革命這樣的大件事，也沒有出去看過」，¹³ 只是在家裡抄書。

¹⁰ 蕭振鳴：《魯迅的書法藝術》（桂林：灑江出版社，2014年）。

¹¹ 夏曉靜：〈拓片上的記憶——魯迅和周作人的兄弟情〉，《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6期，頁79-84。

¹² 常乃熹：《中國思想小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116。

¹³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1971年），頁252。

他「統觀全局，則官威如故，民瘼未蘇」，¹⁴對現實政治失望，轉而求諸思想文化建設。自1913年3月被選舉為紹興教育會會長之後，他於地方文化事業日漸熱心起來：創辦並編輯《紹興縣教育會月刊》（1915年3月起，改為《紹興教育雜誌》），以此為陣地，倡言兒童教育、風俗調查、古蹟調查保護。他援引歐美設立專司、日本設立史蹟及天然物保護會之例，建議效仿；同時以嘉慶年間阮元巡撫浙江為例，敘述阮元「設復防護工事，調查兩浙名人祠墓，由有司保護之，山會二邑所屬，如禹陵、倉頡祠、曹娥廟、朱買臣、馬臻、梅福、蔡邕、王羲之、賀知章、陸游、唐琦諸宅墓，皆有其著者。有明一代，多氣節之士，故其數尤眾」，由此批評紹興當地視古蹟為棄地，假破除迷信為由毀壞古廟，呼籲：「苟於國民文化有所關者，皆宜一律保存」，「所以供賞鑑，資研究」，¹⁵並指出破除迷信在於改革弊習，而非拔除宗教。同時期任職教育部的魯迅在其撰寫的工作綱領中，有關「保存事業」的旨意與周作人相同，區別只在中央與地方：

……若史上著名之地，或名人故居、祠宇、墳墓等，亦當令地方議定，施以愛護，或加修飾，為國人觀瞻游步之所。

碑碣：椎拓既多，日就漫漶，當申禁令，俾得長存。

壁畫及造像：梵刹及神祠中有之，間或出於名手。近時假破除迷信為名，任意毀壞，當考核作手，指定保存。¹⁶

進入1915年，周作人開始大量搜集碑帖、造像、墓誌、古錢、古鏡、古磚、地契、經幢等金石實物或拓片。這一年的金石行蹤，《周

¹⁴ 獨（周作人）：〈民國之徵何在〉，收於周作人著，陳子善、張鐵榮編：《周作人集外文》上冊（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年），頁124。

¹⁵ 啟明（周作人）：〈論保存古蹟〉，收於周作人著，陳子善、張鐵榮編：《周作人集外文》上冊，頁145-146。

¹⁶ 魯迅：〈擬播布美術意見書〉，收於魯迅著，張望編：《魯迅論美術》（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頁4。

作人日記》裡有詳細記載（參見文末附錄1）。活動如此密集，將1915年稱作周作人的「金石年」也不為過。進入1916年，金石搜集活動有所減少。1917年4月，周氏進北京，此前仍有金石訪查活動（詳情參見附錄2、3）。¹⁷

他在搜集金石實物的同時，也開始了碑刻考證工作。1915-1916年，發表的相關論述有：

- （一）「讀書雜錄」系列，包括〈禹陵窆石題字〉、〈妙相寺造像題字〉、〈跳山建初買山石刻〉，《紹興教育雜誌》第6期（1915年4月）。
- （二）〈餘姚三老碑〉，《紹興教育雜誌》第7期（1915年5月）。
- （三）〈唐龍瑞宮記〉、〈唐董昌生祠題記〉、〈吳越崇化寺西塔基記〉，《紹興教育雜誌》第8期（1915年6月）。
- （四）〈建初買山題記〉、〈蕭二將祠堂記〉，《紹興教育雜誌》第9期（1915年8月）。
- （五）〈三老碑〉、〈禹寺往生碑〉，《紹興教育雜誌》第10期（1915年12月）。
- （六）〈紹興古刻存目〉、〈越中名勝雜說〉，《紹興教育雜誌》第11期（1916年1月）。
- （七）〈義國夫人虞氏墓誌銘〉、〈越中游覽紀錄〉，《紹興教育雜誌》第12期（1916年2月）。
- （八）〈越中磚荊文錄〉，《紹興教育雜誌》第13期（1916年3月）。
- （九）〈三老碑考證集錄上〉，《紹興教育雜誌》第15期（1916年6月）。
- （十）〈三老碑考證集錄下〉，《紹興教育雜誌》第16期（1916年10月）。

周作人引證古籍，其中所涉古籍有《東陽記》（〔南朝宋〕鄭緝之〔420-479〕）、《輿地志》（〔南朝梁〕顧野王〔519-581〕）、《三

¹⁷ 周作人：《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上冊（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頁537-612。

寶感通錄》（〔唐〕道宣〔596-667〕）、《太平寰宇記》（〔北宋〕樂史〔930-1007〕）、《嘉泰會稽志》（〔南宋〕施宿〔1164-1222〕等）、《輿地紀勝》（〔南宋〕王象之〔1163-1230〕）、《保越錄》（〔元〕徐勉之〔?-?〕）、《金石契》（〔明〕祝肇〔?-?〕）、《文飯小品》（〔明〕王思任〔1574-1646〕）、《徐文長集》（〔明〕徐渭〔1521-1593〕）、萬曆《紹興府志》（〔明〕張元忭〔1538-1588〕、孫鑛〔1543-1613〕）、《越中園亭記》（〔明〕祁彪佳〔1602-1645〕）、《越中古刻九種》（〔清〕王繼香〔1860-1925〕）、《金石記》（〔清〕繆荃孫〔1844-1919〕）、《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清〕繆荃孫）、《清儀閣金石題識》（〔清〕張廷濟〔1768-1848〕）、《補寰宇訪碑錄》（〔清〕趙之謙〔1829-1884〕）、《越縵堂日記》（〔清〕李慈銘〔1829-1894〕）、《餘姚縣志》（〔清〕孫德祖〔1840-1908〕）、《嘉慶縣志》（〔清〕阮元指導）、《兩浙金石志》（〔清〕阮元主編）、《兩浙金石志補遺》（〔清〕阮福〔1801-1875〕）、《越中金石記》（〔清〕杜春生〔1785-?〕）、《蒿里遺珍》（羅振玉）、《蕭二將祠堂記》（著作年代和作者均不詳）、《上虞金石志略》（〔清〕錢玫〔?-?〕）、《春在堂隨筆》（〔清〕俞樾〔1821-1907〕）、《金石萃編》（〔清〕王昶〔1725-1807〕）、《續語堂題跋》（〔清〕魏錫曾〔1828-1881〕）、《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清〕僧達受〔1791-1858〕）、《越中文獻輯存書》（〔清〕《紹興公報》社編）、《越園紀略》（〔明〕呂天成〔1580-1618〕）、《讀碑小識》（羅振玉）、《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羅振玉）和《校碑隨筆》（方若〔1869-1954〕）等等，疏碑之本事，搜採輯比，邏輯分明，條理井然。如果對照周作人寫於1944年的〈我的雜學〉，就知道這些地志、金石文字、日記、遊記、家訓、石刻經等書籍，是他自幼年時代就開始閱讀的，是有別於科舉八股的「非正統的。因此常為世人所嫌憎，但是自己相信其所以有意義處亦在於此」。¹⁸ 周氏練就的「非正統」童子功，本來「無用」，但他在1910

¹⁸ 周作人：〈我的雜學〉，收於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93。

年代的古蹟保存論卻具有高度目的論意義，於是，非功利性的閱讀與現實關懷相套疊，經由他這個當地教育官員的身分轉化，就起到了將新的思想觀念（古物保存、宗教思想等等）向下滲的道義事功化之效，「無用」的史學考證完成了過去與現在不間斷的對話，也是周作人對阮元→俞樾→章太炎這一樸學脈絡、同時也可以說是碑學脈絡的繼承。這裡或許有人會對把章太炎放在碑學系譜中提出異議。章太炎似乎對康有為的尊碑貶帖論不以為然，他在 1920 年代的《國學叢刊》、《制言》等刊物上，發表有關〈散氏盤〉、〈三體石經〉、碑版、法帖之別以及鐘鼎彝器款識的著述，表達了宗晉帖——恰為康有為所貶斥——的書法中「古學」，晚年又作〈論碑版法帖〉，¹⁹ 被認為是在碑學風靡的時代倡導帖學的檄文，惜議論過於平實，以個別保存完好之帖，來駁斥康有為振聾發聵的卑帖之說，不可避免地淹沒在尊碑時代的聲浪中。章氏在〈答汪旭初論碑文書〉一文中又謂：「與魏隋諸碑，體制大同，風骨有異。夫唯明練典訓，屏絕華飾。寧拙勿巧，寧疏勿密，斯乃漢人所獨擅。魏隋無以庶幾也。專務為此，亦病多公家言。下涉魏隋，又嫌體弱，若夫南朝碑版一二存者。張皇過甚，泛於盛唐，一碑至二三千言，復有詞費之誚。」²⁰ 其中的審美取向與傅山（1607-1684?1685?）（「四寧四毋」論）、阮元等倡碑者相類，究其實質，可以認為章太炎反對的是「借書法以文飾其政論」²¹ 的今文經學提倡者康有為，而不是提倡碑學的康有為；同時也可以看出民國時期碑學的統治地位。

再說周氏兄弟。相同的考證對象，比如會稽禹廟窆石為例，二人的論證風格卻不同。周作人寫於 1915 年的〈禹陵窆石題字〉，引用的是《兩浙金石志》、《嘉泰會稽志》、《太平寰宇記》、《保越錄》、〈先

¹⁹ 章太炎：〈論碑版法帖〉，《制言》第 11 期，1936 年 2 月，頁 1-3。

²⁰ 章太炎：〈答汪旭初論碑文書〉，《制言》第 29 期，1936 年 11 月，頁 2。

²¹ 本處借用梁啟超評價康有為「借經術以文飾其爭論」之說，將「經術」改為「書法」。梁氏之說，見梁啟超著，夏曉虹點校：《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35。

後游吾越諸勝記》等文獻，對碑石的歷史及碑文加以考證和確認，品評碑拓和自己收藏拓片的過程等，還夾雜著個人的議論、推測；魯迅 1917 年寫作〈會稽禹廟窆石考〉時調動的古籍資源更豐富，有平氏(?-?)的《紹興志》、《輿地志》、王昶的《金石萃編》、《太平寰宇記》、阮元的《金石志》、《嘉泰會稽志》和俞樾的《春在堂隨筆》，全部為實錄文字，考證更為詳贍，並且無一字無來歷。

總體來看，魯迅在收藏和輯校碑石方面，比周作人用力更多、成就更大：《魯迅輯校石刻手稿》輯校兩漢至隋唐碑拓 790 種、摹寫手稿 1700 多頁；《俟堂專文雜集》共收漢魏六朝古磚拓本 170 件、隋 1 件、唐 1 件；《六朝造像目錄》共收造像 1335 件、造像題記 343 篇。目前魯迅博物館藏周作人所藏拓片約有 170 枚，大致可分三種類型：一是石刻，即刻石、碑碣、漢畫像、摩崖、造像、墓誌、經幢和買地券；二是吉金類，即鐘鼎、銅鏡和古錢，數量極少；三是陶文類，即古磚、瓦當、硯和印章。他收藏銅鏡、古錢、古磚和印章的實物相對較多，拓片較少。實物中關於印章的，筆者已經專文論述過，²² 這裡不再贅述。收藏拓片種類最多的是墓誌 114 枚，占總量的 67%，除了 6 枚六朝墓誌，其餘全為隋唐墓誌；漢畫像有 20 枚；經幢 3 枚；寫經 8 種；其餘刻石、碑碣、摩崖、造像有 40 種。從拓片數量上看不夠可觀，不過大多為名品，尤其是〈石門頌〉、〈石門銘〉諸碑，都是各自時代最具藝術特色的名碑之一。楊守敬稱〈石門頌〉「其用筆如閒雲野鶴，飄飄欲仙，六朝疏秀，皆從此出」；²³ 康有為則在《廣藝舟雙楫》中稱〈石門銘〉為「神品」，讚其「若瑤島散仙，驂鸞跨鶴」。²⁴ 其他如〈玉盆碑〉、〈範式碑〉、〈鄭固碑〉等，也均為碑刻中的傑作。

²² 陳言(陳玲玲)：〈印章和書法裡的周作人書齋〉，《魯迅研究月刊》2018 年第 10 期，頁 58-64、77；陳言(陳玲玲)：〈周作人印章中的趣味、學問、交往和政治〉，《新文學史料》2019 年第 1 期，頁 51-67。陳言是筆者的筆名，特此說明。

²³ 楊守敬：《楊守敬評碑評帖記》(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頁 26。

²⁴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收於潘運告編注：《晚清書論》，頁 378、380。

從周作人的藏品來看，他諳熟碑學脈絡，但窘於財力，會搜集便宜、小巧的藏品，如墓誌，特別是唐墓誌。唐代墓誌數量龐大，但自康有為「卑唐」說流行開來，唐墓誌始終不為人重視。不過唐墓誌並非沒有可取之處，周氏藏品中有關〈高湛墓誌銘〉、〈司徒公廣陵王墓誌銘〉、〈仵君墓誌銘及蓋〉、〈桓君夫人張氏墓誌〉等的著錄很多，書法成就也很高，再加上周作人別樣的審美眼光，汲取的面向自然有別於俗流，得其筆意，其書亦足以成一家。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墓誌中集北魏墓誌書法之大成的〈張黑女墓誌〉，也被周氏收入囊中。

周作人在碑學上的成就，集中體現在其擔任紹興教育會會長時期。上文提到的蕭振鳴，在論述魯迅書法藝術時，將周作人所藏的相關書籍，都不加區隔地放到了魯迅所藏金石書法類圖書或拓片裡；而上面所鈐周氏的「會稽周氏收藏」、「周作」、「起明所拓」等印章，以及周氏兄弟的日記則可以提供反證；比如魯迅博物館所藏《兩漢金石記》、《金石萃編》、《流沙墜簡》、《淮陰金石僅存錄》、《金石苑》等金石學著作，鈐有周氏兄弟兩人的印章。1950年代之後的周作人書寫魯迅，是其賴以生存的政治護身符。他所描述的魯迅幼年時代的金石學興趣、教育部時期魯迅的抄碑的目的、抄碑的方法，²⁵ 那些方法又何嘗不為他本人所用呢？京、浙兩地周氏兄弟共同的閱讀史，足以讓其中一個成為另一個的參照框架，這是後來的研究者需要注意的。至於周作人，他這一階段的金石鑑藏考證活動，鮮有提及。但如果考慮到1910年代初中國古蹟保存觀念薄弱的實態，他主動疏離現實政治運動，辦刊物、鑑藏金石，並且搜集越地風俗、兒歌，倡言兒童教育；用王汎森的理路來解釋，即他的菁英思想通過層層轉手，在生活中變得「可行動化」，不斷擴散、下滲到下層社會，於是，思想生活化了。²⁶

²⁵ 周作人：〈抄碑的方法〉，收於周作人著，止庵校訂：《魯迅的故家》，頁349-350。

²⁶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

辛亥革命之後的周作人，在越地的田野工作上下了很大工夫，借用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 1926-2006）的話說，就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²⁷ 即對隱涵在越地不同層面的、個別的言動中的共同意義，其相互交織的面向進行整理和記錄。但他又是有別於一般人類學家的局內人、在地菁英和官員，所以迫切地要把他所理解的在地文化的多樣性作為啟蒙資源加以轉化。進入北京之後的周作人，仍然始終關注鄉邦文獻的蒐集整理，在他那裡，地方性知識上升到了民族誌的高度——這是另外一條進入周作人思想的路徑，這裡不打算展開。

三、與朋儕共享的「精神貨幣」

所謂「精神貨幣」（spiritual currency），是美國文學批評家、修辭學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 1897-1993）提出的概念，²⁸ 本處借用並擴展論述。貨幣被定義為交換媒介，「精神貨幣」則是基於同理心、目的、信仰，經過自身儲備，在基因傳承力強大的文化人之間，或者在親密的朋儕間流通的媒介，它不出現在偶然的熟人之間。前者體現為不同代際知識人之間在學脈上的傳承，而後者表現在朋儕之間藏品的展示、交流、交換和贈送；比如前述的碑學在清代、民國之間的傳承，比如章門弟子之間的閱讀互動。

這裡，首先以 1920-1930 年代蔓延在北大知識菁英小圈子內的碑學及六朝寫經的風氣為例。1900 年，敦煌經卷被發現，陸續遭到英國、法國、日本和俄國的劫掠。從 1904 年開始，羅振玉利用法人

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

²⁷ 克利福德·格爾茨著，韓莉譯：《文化的解釋》（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 年），頁 3；克利福德·格爾茨著，楊德睿譯：《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年），頁 1。

²⁸ Kenneth Burke, *Attitudes Toward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79.

伯希和 (P. Pelliot, 1878-1945) 送給他的部分經卷的照片，編纂了《敦煌石室遺書》，又陸續撰寫了《鳴沙山石室祕錄》、《敦煌石室書目及我見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祕錄》等著作。到了 1910 年，部分敦煌文獻才被運到北京。1906 年開始，英國探險家斯坦因 (M. Aurel Stein, 1862-1943) 深入新疆、甘肅等地考察，發掘出大量簡牘，次年將其帶回國，利用西方先進的攝影技術影印，交由漢學家沙畹 (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整理考釋。1912 年，寓居日本的羅振玉從沙畹處得到相關資料，與同在日本的王國維對這些資料加以考釋，取名《流沙墜簡》；1914 年，在京都出版，書中所涉之容易毀朽的簡牘文獻始被認知和傳世。《流沙墜簡》很快從日本傳至國內。羅振玉自幼愛好金石名物，20 歲寫就《讀碑小傳》。他對敦煌經卷和西北簡牘的傳世居功厥偉。郭沫若 (1892-1978) 對羅振玉的貢獻有這樣中肯的評價：「在中國文化史上實際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遺臣自任的羅振玉，特別是前兩年跳水死了的王國維……欲清算中國古代社會，我們是不能不以羅、王二家之業績為其出發點了。」²⁹ 以羅、王為首，整理的敦煌經卷數量龐大，水平有別，風格各異，其中六朝寫經頗受知識人的喜愛。周作人在其紹興時代的金石考證資料裡，列有多項羅振玉的著述，後來始終都在追尋羅氏的金石蹤跡 (僅僅是金石蹤跡，周極為反感遺老羅振玉)。魯迅更是關注羅著及敦煌寫經。1912 年 8 月 20 日，魯迅日記記載：「同司長並本部同事四人往圖書館，閱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寫經」；³⁰ 同年 10 月 6 日，「又購《敦煌石室真跡錄》一部，銀一兩」；³¹ 10 月 20 日，「上午往留黎 (作者按：琉璃) 廠購《汗簡箋正》一部，三元」。³² 1923

²⁹ 郭沫若：〈自序〉，《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頁 3。

³⁰ 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魯迅手稿全集·日記》第 1 冊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年)，頁 27。

³¹ 《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魯迅手稿全集·日記》第 1 冊，頁 37。

³² 《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魯迅手稿全集·日記》第 1 冊，頁 40。

年，留學法國的劉半農（1891-1934），到巴黎的國家圖書館抄其館藏的敦煌石室寫經，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這一類的東西，巴黎所有的，我在兩年前已苦了近半年的功夫抄完了。」³³ 回國之後，他斷定漢字最終拼音化並提倡簡化字，同時力倡敦煌寫經體。1925年，《京報副刊》組織「青年必讀書」的徵集活動，魯迅主張：「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³⁴ 可是差不多同一時期，魯迅對王國維、羅振玉所做的「國學」則加以盛讚：「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³⁵ 1910年，從日本回國的錢玄同「常和沈尹默、周生相見，見他們的字寫得很好，於是又想來研究書法，因此臨魏碑」；³⁶ 「五四」時期，錢玄同公開主張廢除漢字，他反覆臨習〈秦泰山刻石〉、〈袁安碑〉、〈袁敞碑〉、〈曹魏蘇君神道〉、〈爨寶子〉、〈董洪達造像〉等碑，又公開提倡「廢楷用篆」的文字復古理論，主張：「凡秦刻石、權、詔版、印、瓦、漢碑額、〈開母〉、〈少室〉、〈天發〉、〈國山〉及秦漢書器、漢印……，皆小篆也，……何故不寫乎？」³⁷ 又潛心臨摹〈開成石經〉、《敦煌石室晉人寫經》、魏晉寫經墨跡，以及錢坫（1744-1806）、楊沂孫（1813-1881）、鄧石如（1743-1805）等人的篆書，最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寫經體。當代美術史家白謙慎評價錢氏「是當時取法敦煌六朝寫經書法的學者中成就最高的一位」，³⁸ 而錢玄同對自己的書法也頗為自信。周作人曾將中村不折仿製的漢魏六朝毛筆贈送給錢玄同，錢氏為此特意給弟子魏建功（1901-1980）寫了封信，說：「本日得專齋所贈中村不折氏所制之漢魏六朝書用筆，取以

³³ 劉復（劉半農）：〈致吳立模書〉，《文學》第4版，1924年2月11日。

³⁴ 柯柏森：〈偏見的經驗〉，《京報副刊》第79號，1925年3月，頁39。

³⁵ 魯迅：〈不懂的音譯〉，《熱風》（上海：北新書局，1925年），頁105。

³⁶ 錢玄同著，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336。

³⁷ 錢玄同著，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下冊，頁1284。

³⁸ 白謙慎：《與古為徒和娟娟髮屋：關於書法經典問題的思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30。

試寫，雖覺艱澀，顧亦頗感奇趣，私意當用之純熟，必有得心應手之快感。彼時若偽作漢晉書影，敢斷言必勝於某君所寫之陶詩卷子也。呵呵。」³⁹ 他的自信從「呵呵」聲中就帶了出來。到了1933年，錢玄同試圖將他所受到的碑學理論的影響，應用到漢字簡化上。他在是年11月19日的日記裡寫道：「近思生活太枯燥，必須找一趣味之事調節之，想來想去，還是賞鑑書法，忽將廿年前注意之包、康兩家書及《書道全集》中所印之魏碑等取出玩之。實亦與簡體字不無關係也。近覺包氏草書功夫極深，康氏氣魄極大，筆力極雄偉（因彼反對包氏運指論而主張運腕論也），然至老而一筆不苟的寫字，近世惟沈子培一人耳。」⁴⁰ 他推崇碑學一脈，包括沈曾植，但是對政治思想守舊的沈曾植卻不屑一顧，斥之「頑固老儒」。⁴¹ 魏建功在書法上亦追隨老師，作唐人寫經體。魯迅、西諦（鄭振鐸，1898-1958）編《北平箋譜》，魯迅很是看重魏建功的書法，邀請魏建功來書寫魯迅本人為該書所作的序，序文的寫經風格極為鮮明。錢稻孫也異常關注敦煌寫經。前面說過，敦煌寫經部分流入日本，其中《志玄安樂經》經由京都大學教授羽田亨（1882-1955）整理抄錄，首次發表在日本《東洋學報》上，錢稻孫在第一時間將羽田亨的成果介紹到了國內。⁴² 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適（1891-1962），曾在1936年7月為《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作序。周作人評價錢玄同的一生在復古與反復古之間游移；⁴³ 然而，這種矛盾同樣體現在周氏本人及其同時代人的身

³⁹ 原跡無所見，轉載自白謙慎：《與古為徒和娟娟髮屋：關於書法經典問題的思考》，頁130。此信寫於1932年3月1日，《錢玄同日記》裡記載這一天他「晚訪啟明」（錢玄同著，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中冊，頁849）。

⁴⁰ 錢玄同著，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中冊，頁970-971。

⁴¹ 錢玄同著，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中冊，頁971。

⁴² 羽田亨：〈景教經典志玄安樂經に就いて〉，《東洋學報》第18卷第1號，1929年8月，頁1-24；羽田亨著，錢稻孫譯：〈景教經典志玄安樂經考論〉（節譯本），《清華周刊》第32卷第10期，1929年12月，頁23-30。

⁴³ 周作人：〈錢玄同的復古與反復古〉，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94輯（北京：文史資料出

上。晚清至民國時期，碑學理論已然深入知識菁英階層，在他們中間借助新出土的資料，形成了書法技法上的復古主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全盤西化浪潮中並行不悖。

周作人寫於 1936 年的〈談戒律〉一文，⁴⁴ 詳述了他讀經、購買經卷、圍繞經卷與友人交往、思想受濡染之過程。他最早接觸佛經是在 1904 年。「五四」之後的周作人，研讀、蒐集大量的佛經拓本，還在北大國文系講授「佛教文化」課程。從周氏審美觀考察，敦煌經卷中類似「窮鄉兒女造像」（康有為語）⁴⁵ 的不規整、充滿意趣的墨跡是吸引他的理由。在他所藏的拓片中，有《心經》碑拓、泰山《金剛經》拓和唐人寫經。而周氏書法中的寫經體，也為朋儕所共識。1934 年夏，周作人去日本；8 月 18 日，往訪中村不折；8 月 20 日，「訪中村不折君，觀所收藏，以所印漢魏寫經一帖見贈（作者按：漢魏寫經影本）」。⁴⁶ 中村所藏敦煌寫經，主要來自當年的新疆布政使王樹楠（1851-1936）；王樹楠的藏品主要得自收藏家李盛鐸（1859-1934）；在王死後，其所藏散落平津市肆，結果大多被日本大古董商江藤濤雄（1877-1952）購走，後又全部易手於中村不折；其他來源還有梁素文（?-?）、何孝聰（?-?）等。中村、周作人交往的細節，筆者尚未來得及稽考；不過可以想見，是因為中村對周氏的愛好與擅長有所瞭解，才將漢魏寫經帖（影本）贈予他的；不過只是影本，而非真跡。在周作人所見到的寫經真跡中，大概是弘一法師所書《華嚴經》偈，讓他最為震動了。1935 年 6 月 27 日，周氏在弘一法師〈華嚴經偈〉書幅後作題跋：「昔在月夜書屋見弘一上人書，今又得見此幅，歡喜讚嘆。上人書蓋如其人，覺有慈祥靜穆之氣拂拂從紙上出，對之如聽說法，此可謂之文字禪，正是一筆不徒下者也。二十四年六月

版社，1984 年），頁 98-117。

⁴⁴ 周作人：〈談戒律〉，《青年界》第 10 卷第 2 期，1936 年 9 月，頁 75-78。

⁴⁵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收於潘運告編注：《晚清書論》，頁 369。

⁴⁶ 周作人：《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下冊，頁 665。

二十七日晨敬題。」⁴⁷ 這是周作人在落款中唯一一次出現「敬」字，見弘一法師真跡如面對活佛般敬重虔誠，他深感如露如電；巍峨浩蕩的內薰之氣、精嚴淨妙的書法，都是打動周氏的地方吧。有意思的是：寫於 1935 年的這篇題跋，公之於世卻是在 1938 年 6 月；其時，他自稱「出門托鉢的老僧」；⁴⁸ 而與他同在淪陷北京苦住的學生顧隨（1897-1960），在給老師的信中，提到了老師為弘一法師書所作的題跋，也讚老師「雍雍穆穆」，以此反襯自己的浮氣、躁氣、愁苦氣；⁴⁹ 然而，事實上 1938 年的周氏，在精神上搖晃得厲害，重提弘一法師是用以自證脫俗，還是用以警醒？說不清。固有可深長思之者。

晚清、民國人物對六朝文字尤為關注。康有為自述其學書「浸淫於南北朝，而知氣韻胎格」，⁵⁰ 極為推崇六朝書；中村不折將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譯介到日本，書名乾脆改為《六朝書道論》。「夙抱傳古之志」的羅振玉，⁵¹ 編有《六朝墓誌菁英》和《六朝墓誌菁英二編》。魯迅說自己在紹興會館抄六朝墓誌「等於吃鴉片」，⁵² 同時編纂有《六朝造像目錄》（未印）以及《六朝墓誌目錄》（未完成）。補樹書屋裡的周作人，在讀書的同時，繼續幫助魯迅抄寫古籍，蒐集造像、墓誌、古磚等金石；紹興時期的周作人，留下不少碑碣造像的考證文字；但是進入北京時期，即便是對藏品中的精品，他也不留文字，故當筆者查閱到周氏所藏拓片目錄時，不由得吃驚；但是周氏對古磚的態度則不同，持續的興趣最為持久，留下的文字也很多，他

⁴⁷ 知堂（周作人）：〈題弘一法師書〈華嚴經偈〉〉，收於周作人著，陳子善、張鐵榮編：《周作人集外文》下冊，頁 516。

⁴⁸ 周作人 1938 年 9 月 21 日寄給胡適的信中有一首白話詩，詩中說：「出門托鉢募化些米麵，老僧始終是個老僧。」本處說法來自周氏此白話詩。見張菊香、張鐵榮編：《周作人研究資料》上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131。

⁴⁹ 顧隨著，顧之京、趙林濤、高獻紅主編：《顧隨全集》第 9 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 年），頁 6。

⁵⁰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收於潘運告編注：《晚清書論》，頁 436。

⁵¹ 羅振玉：《羅振玉自述》（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 年），頁 203。

⁵² 劉半農：《半農談影》（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00 年），頁 2。

對藏磚加以著述、製成拓片、信箋，贈與友人，並且以磚來命名書齋，如「鳳凰專齋」，再將其入印。劉半農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雙鳳凰磚齋」，乃因「昔苦雨老人得一鳳凰磚，甚自喜，即以名其齋。今余所得磚乃有雙鳳凰。半農他事或不如啟明，此則倍之矣」。⁵³ 如果將周氏的瓦甃之好，放在他同時代的朋儕中間，足以顯出他的獨特；不過放在清中晚期以來深受樸學影響的江浙文人系譜中，並不突出。碑學大家阮元有古磚癖，官至浙江學政、巡撫期間，多方收藏古磚，書齋名為「八磚吟館」；其弟子張廷濟則有「八磚精舍」，謝啟昆（1737-1802）有「八磚書坊」。嗜磚風氣漸起，翁方綱（1733-1818）、吳大澂（1835-1902）、俞樾等名流亦參與推動，一直延續至民國，以吳昌碩最為矚目。有學者統計，這一時段出現的古磚著述「多達四五十種」，⁵⁴ 古磚的學術、藝術價值得以最大程度的彰顯。如果放到這個脈絡中，周作人只不過是餘音絕唱。1928年，周氏特意解釋自己磚齋的含義：

何謂專齋？此有三義。甲，齋中有一塊古磚，因以為號焉。乙，專者不專也，言於學問不專一門，只是「三腳貓」地亂說而已也。丙，專借作顛，顛蒙愚魯。昔者《狂飆》主人為預言三世，初為開明，繼為豈明，復次當為不明，今故奉教以專為名爾。三者義各有當。談及古董時取甲義，妄論學藝，則取乙義，又若對於社會信口雌黃，有違聖教，不洽輿情，老夫攢眉，小生膈發，乃悉由於不明之故，應作丙義解也。⁵⁵

酷愛清玩，但不專業，只是三腳貓的功夫，與專業的藏家比，周氏的自我定位倒沒什麼不妥；但這番自謙背後，實則藏著不合時流的叛逆

⁵³ 劉半農：〈雙鳳凰磚齋小品文〉，《人間世》第1卷第1期，1934年4月，頁12。

⁵⁴ 梅松：《道在瓦甃：吳昌碩的古磚收藏與藝術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頁21。

⁵⁵ 周作人：《專齋漫談》序，《永日集》（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頁343。

態度：對社會信口雌黃、違聖教、不恰輿情，即「顛蒙愚魯」，那是個內心的「叛徒」和「隱士」邊打架、邊共處的周作人。他的閱讀和生命態度，是一仍其舊地非正統；然而，從文化基因的傳承來看，他又是一個復古者，不停地吐納，融士大夫和現代知識分子的部分特質於一體。

在對周作人收藏的印章進行考辨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周氏對六朝文字的印章相當喜愛，而這一嗜好也感染了他的周邊朋儕，比如沈啟無（1902-1969）。⁵⁶ 六朝書體處在新舊字體的演變過程中：上接漢隸，下啟唐楷，蘊涵著不被規範的野性和活潑生命力，都令人迷戀。他除了欣賞六朝書藝，也注重六朝人的風度和性情。1933年，周氏得永明磚，說「至可寶愛」，「大沼枕山句曰，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此意余甚喜之」。⁵⁷ 對六朝人物的喜愛，又延續到晚明人物身上；周氏與公安、竟陵派的文脈淵源，學人多有探討；但若放置在碑學一脈中，則又有另一條文脈供其感應和吐納。

四、與碑學一脈晚明文人的親和性

從心性、氣節、生活方式、書法文章到審美趣味等不同層面，深為周作人喜愛的是晚明遺民傅山。傅山早在明亡之前就開始研究金石學，與顧炎武（1613-1682）、閻若璩（1636-1704）、朱彝尊（1629-1709）等樸學大家往還密切。清初訪碑，亦有撫殘碑、思故國之意。傅山沒有系統的書論，在〈訓子帖〉中提出的「四寧四毋」之說（「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⁵⁸ 可以推測來源於

⁵⁶ 沈啟無：〈刻印小記〉，《人間世》第21期，1935年2月，頁26。

⁵⁷ 知堂（周作人）：〈題永明三年磚硯〉，《藝風》第1卷第7期，1933年7月，頁6。

⁵⁸ 傅山的〈訓子帖〉亦稱〈作字示兒孫〉，為傅山對兒孫言傳身教之文，作於清軍入關之後，著眼於做人與作字二者間的密切關係。文中既表明了自己的民族意識和遺民立場，也闡發了美學觀。他倡言「四寧四毋」中之

他對碑版書法風格的總結提煉，被後世的書家視為碑學第一聲；而他本人的書風、文風，也以此為原則進行實踐。他訪碑、臨碑，以為學書要溯本求源，「楷書不知篆隸之變，任寫到妙境，終是俗格」，⁵⁹又謂：

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即奴態不足觀矣。此意老索即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謂篆、隸、八分，不但形相，全在運筆轉折活潑處論之。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自然之妙，竟以安頓失之。按他古篆、隸落筆，渾不知如何布置，若大散亂，而終不能代為整理也。寫字不到變化處不見妙，然變化亦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能變出。……但能正入，自無卑賤野俗之氣。然筆不熟不靈，而又忌褻，熟則近於褻矣。⁶⁰

他提倡「拙」、「醜」、「支離」、「直率」，又最討厭「奴俗氣」；⁶¹這在周作人的澀、苦、忌「作態」的書法和文字風格中，⁶²表現得相當清晰；不講音樂性的韻律，也摒除繪畫的色澤，誠如郁達夫（1896-1945）所說的：「苦澀蒼老，爐火純青，歸入古雅遒勁的一途」。⁶³傅山說：「文章詩賦，最厭底是個『嘽』字。嘽，緩也。俗語謂行事說話，鬆沓不

「拙」、「醜」、「支離」、「直率」，意即藝術上的簡率、純樸、平淡、自然的風格。見傅山：《作字示兒孫》，收於葉朗主編：《中國歷代美學文庫：清代卷》上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91。

⁵⁹ 傅山著，侯文正注解：《傅山論書畫》（太原：三晉出版社，2015年），頁47。

⁶⁰ 傅山：《家訓·雜訓二》，收於傅山著，尹協理主編：《傅山全書》第2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卷31，頁255。

⁶¹ 傅山：《家訓·雜訓二》，收於傅山著，尹協理主編：《傅山全書》第2冊，卷31，頁255。

⁶² 周作人在審美上嗜苦喜澀，齋號往往以「苦」命名，如苦雨齋、苦茶庵、苦住庵等；文風忌滑順而求澀。至於「作態」，周氏非常討厭，他說：「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態，犯時文章就壞了。」見周作人：〈談文章〉，收於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頁592。

⁶³ 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收於陳平原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頁181。

警曰曄。」⁶⁴周作人作〈本色〉小文，做相隔 200 年的回應：「寫文章沒有別的訣竅，只有一字曰簡單。」在該文中，周作人還言及：「近來讀清初筆記，覺有不少佳作，王漁洋與宋牧仲，尤西堂與馮鈍吟，劉繼莊與傅青主，皆是。」⁶⁵在《立春以前》的後記中，周氏說：「說到文章，實在不行的很，我自己覺得處處還有技巧，這即是做作，平常反對韓愈方苞，卻還是在小時候中了毒，到老年未能除盡，不會寫自然本色的文章，實是一件恨事。」⁶⁶

不獨書風、筆調，周作人亦欣賞傅山的人生境界。在閱讀馮班（馮鈍吟，1602-1671）的《鈍吟雜錄》時說：「馮氏論事雖有見識，但他總還想自附於聖學，說話便常有矛盾，不能及不固執一派的人，如傅青主，或尤西堂」；接下來又誇「傅君真是解人，所說並不怎麼凌厲，卻著實得要領，也頗有風致，這一點似勝於鈍吟老人也。」周氏很是讚賞傅山通達人情物理。馮班在教弟子時，主張不取嚴師，而「傅青主家訓亦說及這個問題，頗主嚴厲，不佞雖甚喜霜紅龕的思想文字，但於此處卻不得不舍傅而取馮矣」；⁶⁷「霜紅龕」乃傅山對自己棲身隱居之所的命名，該地位於太原城西的崛山，遍山楓樹，逢霜降之時則層林盡染，故題此名；其作品也名為《霜紅龕集》，頗得周氏喜愛，曾多次引用。談及老境，他引用傅山云：「『老人與少時心情絕不相同，除了讀書靜坐如何過得日子。極知此是暮氣，然隨緣隨盡，聽其自然，若更勉強向世味上濃一番，恐添一層罪過。』青主也是兼通儒釋的，他又自稱治莊列者。所以他的意見很是通達。」⁶⁸1935 年前後，寫此文的周作人，再一番讚嘆傅山的通達境界：「壽則多

⁶⁴ 傅山：《家訓·雜訓二》，收於傅山著，尹協理主編：《傅山全書》第 2 冊，卷 31，頁 255。

⁶⁵ 知堂（周作人）：〈本色〉，《北平晨報》「社會研究」，1935 年 12 月 30 日。

⁶⁶ 周作人：〈後記〉，《立春以前》（上海：太平書局，1945 年），頁 195。

⁶⁷ 周作人：〈鈍吟雜錄〉，《風雨談》（上海：北新書局，1947 年），頁 44。

⁶⁸ 知堂（周作人）：〈老年〉，《北平晨報》「社會研究」，1935 年 12 月 20 日。

辱」，⁶⁹ 在周氏 50 歲之後的文字中多次出現，晚年治印「壽則多辱」多枚，以警醒自己的世味之濃。傅山儒釋兼通，道不離日用，而又切近人情，何嘗不是周氏本人的追求呢？他作小文〈關於家訓〉，又提及「青主爲明遺老中之錚錚者，……思想通達，非凡夫所及」；⁷⁰ 錚錚而通達的傅青主，經歷亡國易主之痛，表示「處亂世無事可做，只一事可做，吃了獨參湯，燒沉香，讀古書，如此餓死，殊不怨尤也」；⁷¹ 周氏評論說：

遺老的潔癖於此可見，然亦唯真倔強如居士者才能這樣說，我們讀全謝山所著《事略》，見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學鴻詞的徵召，真令人肅然起敬。古人云：薑桂之性老而愈辣，傅先生足以當之矣。文章思想亦正如其人，但其辣處實實在在有他的一生涯做底子，所以與後世只是口頭會說惡辣話的人不同，此一層極重要，蓋相似的辣中亦自有奴辣與胡辣存在也。⁷²

傅山對於氣節的自我嚴苛，以及知行合一，尤其讓周作人佩服，他稱讚那是「實實在在有他的一生涯做底子」。

1930 年代，曾在北平讀書界興起晚明小品翻刻之風，周作人大體是贊同的；理由是：那些重要的文獻「都是旁門而非正統的，但我的偏見以爲思想與文藝上的旁門往往要比正統更有意思，因爲更有勇氣與生命」；不過這裡講的是「李卓吾以至金聖嘆，以及桐城派所罵的吳越間遺老」，並非晚明的全部。他對公安、竟陵派的思想也有所甄別，擔心晚明文集的翻刻會導致假風雅的流行，直言「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歡的」，在列舉一長串名字之後說，「李笠翁

⁶⁹ 知堂（周作人）：〈老年〉，《北平晨報》「社會研究」，1935 年 12 月 20 日。

⁷⁰ 知堂（周作人）：〈關於家訓〉，《北平晨報》「社會研究」，1936 年 1 月 27 日。

⁷¹ 知堂（周作人）：〈奴俗與真率：關於傅青主〉，《宇宙風》第 7 期，1935 年 12 月，頁 318。

⁷² 知堂（周作人）：〈奴俗與真率：關於傅青主〉，《宇宙風》第 7 期，1935 年 12 月，頁 318。

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見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歡，與傅青主、金聖嘆等視」。⁷³

到了 1945 年，北平結束淪陷狀態，與敵合作者將要面臨公審的時候，周作人則截取傅青主罵人用的「驢鳴狗吠」中的「驢鳴」來罵傅斯年（1896-1950）；⁷⁴同時，在他闡述「道義之事功化」時，認為那些高談理性與道德，而不去求功利上的實現者流，「與傅君所謂驢鳴狗吠相去一間耳」，⁷⁵這裡有極強的自我辯護意味；而傅山所謂的「驢鳴狗吠」，原本指的是作奴俗文者之流。

周氏對傅青主的喜愛，一直持續到晚年；這在論人嚴苛的周作人那裡，並不容易。傅山由訪碑而提煉出他的「四寧四毋」美學思想，他佛道釋兼通，通人情物理，反對奴俗氣；這在周作人那裡得到了隔代繼承，二人的書學、文論、文風、筆調、人生態度，都有諸多相似之處。在考據學興盛，帶來的咬文嚼字之風盛行，而思想界消沉的明末清初，傅山可謂「是有獨立思想的學者」，是「平民生活的思想家。當時的學者多不注重藝術，惟傅山的藝術天才很高，他的詩、書、畫都很絕」。⁷⁶如果放在更長的歷史時段上看，說周作人是有獨立思想的學者作家、平民思想家，也不為過。

周亮工（1612-1672）以收藏印章和漢碑拓本聞名，在文字學和金石篆刻方面的研究也造詣很深；所著《印人傳》詳錄明代中期至清初印人史實、印章風格，並探究印章源流，是研究那一時期印章發展

⁷³ 知堂（周作人）：《〈梅花草堂筆談〉等》，收於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7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89。

⁷⁴ 日本戰敗，國民黨開始整肅漢奸；重慶歸來的傅斯年表示，偽北大教職員皆在附逆之列，將來不可擔任教職；該聲明一出，周作人在當日寫就的文章末尾寫「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記，時正聞驢鳴」。見周作人著，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 6 卷（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101。

⁷⁵ 周作人：〈道義之事功化〉，收於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苦雨齋文叢：周作人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92。

⁷⁶ 常乃惠：《中國思想小史》，頁 100。

的重要文獻；中國國家圖書館目前所藏康熙年間的刻本有兩種，其中一種即為周作人的收藏；周作人還曾經特撰《印人傳》，表現出對其中所流露出的晚明流風餘韻的喜愛。筆者在〈周作人印章中的趣味、學問、交往和政治〉一文中，有簡單論述。周亮工是身歷二朝的文人祿士，入清後經歷兩次彈劾，兩次不死，慨嘆「虛名無益」；⁷⁷ 去世前兩年（1670），盡毀自己的著作版片，不以文字與人交。與顏習齋（顏元，1635-1704）、傅青主一樣，周亮工對假道學、八股很是看不起，而這些也向來為周作人所反對；他曾經引用周亮工《因樹屋書影》的文字批駁道學、載道主義，說那些人「不能虛心體察，以至物理人情都不了解」；⁷⁸ 他從周亮工《印人傳》所著關於海瑞的印章：「文曰司風化之官」，便議論道：「余平日最不喜海瑞，以其非人情也。此輩實即是酷吏，……觀印語，其肺肝如見，我不知道風化如何司，豈不將如戴東原所云以理殺人乎。」⁷⁹ 北平剛淪陷的 1937 年 8 月 31 日，周作人寫下一篇看似閒散的小文〈談瘙癢〉，從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卷四中的瘙癢談起，引申到《北平箋譜》中的搔背圖及題詞「上些不是，下些不是。搔著恰當處，惟有自己知。」接著又用十幾種中日文獻互證；其實，他想說的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⁸⁰ 他始終沒有離開日本人統治的北平，1939 年元旦，遭到槍擊後不久，請壽石工（1885-1950）為自己刻了一枚「忍過事堪喜」的印章，又頻繁使用壽石工為他刻的另一枚叫「冷暖自知」的印章；這裡也是借周亮工的身世處境來理解，並向他人解釋自己的處境吧。

周作人紹興時代讀王思任的《文飯小品》，是將其中的金石文字作為考碑佐證；1930 年代，他寫閱讀筆記的〈文飯小品〉，談的是王

⁷⁷ 柴子英：〈周亮工與《印人傳》及其版本問題〉，收於金鑑才主編：《中國印學年鑑 1988-1992》（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3 年），頁 307。

⁷⁸ 周作人：〈畫蛇閒話〉，《夜讀抄》（上海：北新書局，1934 年），頁 291。

⁷⁹ 藥堂（周作人）：〈記海瑞印文〉，收於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8 卷，頁 70。

⁸⁰ 知堂（周作人）：〈談瘙癢〉，《朔風》第 2 期，1938 年 12 月，頁 46。

思任的性情、氣節、風度，其中謂：「王思任是明末的名人，有氣節有文章」；又談到他寫文章，手法詼諧，「是降龍伏虎的手段，我們也萬萬弄不來」；並且勸那些「正統的載道派」，不必讀王思任：「至於自信爲正統的載道派中人乃可不必偏勞矣。」⁸¹

周氏自紹興時期提倡保護古蹟，就因爲當地多氣節之士，後來不斷提到氣節，特別是晚明文人的氣節，以及他們非正統和人情物理的通達；由此可見，氣節、非正統也即叛逆、理性的清朗，是建立周作人與碑學一脈中晚明文人的親和關係的基礎。而他們的金石收藏和研究、書法技藝、包括對碑學在內的審美理念，則爲周氏帶來了更爲厚實的智識上的樂趣，它也影響到周氏的日常生活。爲了理解知識駁雜的周作人，有必要將他與晚明文人的親和關係進行重組。

五、淪陷下的書寫與行動：非溯其源，處處是障礙

苦住淪陷下的北京，周氏屢屢說是不寫文章的，不過後來看，似乎基本上沒有輟筆。他的隨筆仍然是抄書風，所抄的書，紹興時代的金石、書畫學著作、越地鄉邦文獻，數目繁多。某些書得到翻刻或再版，再次覓得某些紹興時代收藏的拓片，他也會記錄一番；比如《書房一角》（1944）一書中的〈越中金石記〉、〈南齊造像拓本〉、〈桑下叢談·龍虎瓦〉等均屬此類；再比如收入《藥味集》中的〈禹跡寺〉，與淪陷時期自稱「禹民」的他之其他鄉土敘說，可以互相參照；文中夾雜有不少考證文字，然而表達的是懷舊和對現世的眷戀，末尾說的是他那首「禹跡寺前春草生」的名詩，詩的末聯「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太有情」，⁸²就有明顯流露；雖說早期稱「我

⁸¹ 豈明（周作人）：〈文飯小品〉，《人間世》第9期，1934年8月，頁13。

⁸² 知堂（周作人）：〈禹跡寺〉，收於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頁375。

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⁸³此時卻稱「生長於越中，十八歲以後流浪在外，……習性終於未能改變，……還是越人安越而已」。⁸⁴

周氏青年時代關注的金石學家羅振玉，也是越地同鄉。〈存拙齋札疏〉一開篇便不吝給予羅氏最高的讚美：

羅叔蘊不愧為吾鄉傑出之學者，亦頗有見識，其文章樸實尤可喜，所作序跋致佳，鄙意以為近時殆無可與倫比也。⁸⁵

接下來記述羅氏諸種著述版本現狀：

《雪堂校刊群書敘錄》二卷用鉛字排印，雖云仿宋，實不耐觀，深惜其不用木刻。舊刻諸書昔曾有之，已多散失，近日始再搜集，如《讀碑小箋》、《眼學偶得》、《面城精舍文》，均尚易得，《存拙齋札疏》稍少，不意中卻得兩本，略有異同，因合訂存之。⁸⁶

他留心購讀羅振玉的碑學著作，再接下來對羅著的這兩個版本之異同，進行詳細比較記錄。文章最後一句很有意思：

讀羅君晚年所為文，常自炫鬻其忠義，不免如范嘯風言，令人心疲，此則其一病也。⁸⁷

范嘯風（1827-1897）是周的同鄉，著有記錄紹興方言名物的《越

⁸³ 陶然（周作人）：〈故鄉的野菜〉，收於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頁393。

⁸⁴ 知堂（周作人）：〈桑下叢談·小引〉，收於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頁730。

⁸⁵ 藥堂（周作人）：〈存拙齋札疏〉，收於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頁284。

⁸⁶ 藥堂（周作人）：〈存拙齋札疏〉，收於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頁284。

⁸⁷ 藥堂（周作人）：〈存拙齋札疏〉，收於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頁285。

諺》；鄉試不中後，去做紹興師爺。周作人說他染有幕僚的習氣，「自己鼓吹太甚」，被魯迅、許季葦一輩譏笑為「誇翁」；⁸⁸ 周氏以此諷刺晚年的羅振玉，「常炫自鬻其忠義」。忠義氣節，周作人這個時期是不談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說便俗」。⁸⁹ 然而，無論是嘲笑羅振玉的自誇，還是自我保持沉默，都是一種辯解的姿態。雖然嘲諷，他始終保持對羅振玉的閱讀。1944年，周作人翻閱羅振玉、王國維編的《流沙墜簡》，其中的〈致問春君〉竹簡，因寫的是以琅玕贈以名叫「春君」的女子的情書，它區別於竹簡中軍政公文、法律文書、錢糧簿籍等大多數文類，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深深地打動了周作人，他不禁寫下這樣一首詩，以抒思古之幽情：

琅玕珍重付春君，絕塞荒寒寄此身。竹簡未枯心未爛，千年誰與再招魂。《流沙墜簡》中有致春君竹簡。⁹⁰

第二句「竹簡未枯心未爛，千年誰與再招魂」，尤為動情；也是周氏回望歷史時的一次招魂，被鍾叔河認為是周氏七絕中最好的一首。⁹¹

縱覽淪陷時期周作人有關金石、書畫的文字，筆者以為最有哲學思想意味的，是他為傅芸子（1902-1948）《正倉院考古記》（東京：文求堂，1941年）寫的序。

傅芸子在1920年代任《京報》記者時，便與周作人相熟；1932年，赴日任京都帝國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講師，主講中國語言文學；1940年代初，回國執教偽北京大學文學院，同時任職北京圖書館；著有《白川集》等。《正倉院考古記》係作者在日期間，參觀奈良正倉院所藏古物後所作的考證與記錄。正倉院是日本皇室存放貴重

⁸⁸ 知堂（周作人）：〈《越諺》的著者范嘯風〉，收於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4卷，頁199。

⁸⁹ 知堂（周作人）：〈辯解〉，《中國文藝》第2卷第5期，1940年7月，頁2。

⁹⁰ 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詩·補遺〉（其二十），收於周作人著，止庵校訂：《老虎橋雜詩》（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11。

⁹¹ 鍾叔河：《偶然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3年），頁67。

器物的寶庫，藏有我國唐代傳往東瀛的豐富文物珍品。全書分正倉院之由來、價值觀覽、三倉之概觀、結語等五部分，有插圖 25 幅，又附錄圖版 28 幅。為該書作序的除了周作人外，餘者均為日本著名的漢學家，他們是狩野直喜（1868-1947）、松本文三郎（1869-1944）和杉榮三郎（1873-1965）；為該書題名的長尾甲則是書畫藝術家、西泠印社社員，與中國宿著名流交往密切。傅芸子的著作在東京有名的文求堂出版，請日本有名的漢學家作序，也很自然；傅卻非要請文學家周作人為他的考古著作寫序，可見他對周氏的金石學水平有足夠的信任。

周作人在序中說，早在 30 年前，他就讀過大村西崖（1868-1927）所著的《正倉院志》，由此很是嚮往正倉院；他以為古器物「其用不僅限於考古，實在可以說是讀書常識之一部分」，不去考查舊物，則「不能知其本來面目，讀書作畫亦便處處障礙也」；因此，必須上溯本源，才能於今日書藝無礙；接下來，論及中日文化，「唯古稱同種同文，則語本無根，泥古而不通今，論學大忌」，這裡說的是要通古溯源，但是又不能「泥古」，這固然是「論學大忌」，但如果考慮到流行於日本占領區的中日同文同種的口號，就知道這句話大有深意，因為在周作人看來，說是「同文」，但「語本無根」，那麼「同文同種」的論斷與宣傳口號是有問題的；但是接下來，周作人又說：「如或以與中國有關之資料為唯一證據，以為日本古文化即是如此，斯則陷於大謬，無一是處，有如瞽人捫燭以為是日，不但按滅燭光，抑且將灼其指矣。」⁹² 他要強調的是，國人習慣於認為日本的古代文化就是抄襲中國的，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那麼要考證日本古文化，就拿中國相關史料作為唯一的證據，這種觀點是不對的。簡而言之，周氏提醒國人意識到日本文化的獨創性，去除自大的大中華意識，同時指出「同

⁹² 周作人：《〈正倉院考古記〉序》，收於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東京：文求堂，1941年），頁 11-12；桑椹編：《歷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錄》第 3 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 1729-1730。

文」的虛妄性；要對歷史下大工夫，溯源方可以開未來，否則無論文，還是藝，處處是障礙。周作人的這篇序雖然短小，但是包含著周作人對中日文化關係和歷史的基本態度，流露出史家實踐中不同層次的表陳，又暗含著時代關懷，應被視作研究周作人思想的重要文獻。

以上是淪陷下周作人相關文字的表徵。還有涉及戰時下他的行動的，也可一表。日本侵華戰爭結束後，周作人作為文化漢奸被公審。其間保護北大校產，使其不減反增，成為周氏辯護的「功業」之一；據徐祖正（1895-1978）等為周氏辯護提供的證據是：周氏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期間，「首先著手整理前北大研究所檔案，所有歷代文史資料，至今非特史料依然如故，且經周氏整理清楚，各項資料、拓片，亦如大學圖書館所收存之各書，均已編有目錄」，⁹³收購藏家如天津李木齋（李盛鐸，1858-1937）所藏絕版書籍，書目總數增加甚多，這是眾所周知的史實。另外一件事，與戰時北京圖書館有關，隱藏在不多見的文字裡；戰前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南遷，周氏擔任偽教育總署督辦時，設法讓其北歸；傅增湘（1872-1949）在為《國立北京圖書館由滬運回中文書籍金石拓本輿圖分類清冊》寫的序中詳述了這段史實，在「周公啟明（作者按：作人）以教育當局，兼攝館事」的當口，「公以職掌所關，深繫於懷」，設法將其捆載北還，後花費數月「入庫上架，按次歸檔，分別部居」，傅增湘特別提及其中有「敦煌寫經十四卷。其餘古今輿圖、金石拓本，又各數十百種」；⁹⁴黃裳在述及此事時，特別強調此批書中「清冊」所著錄的清刻善本中，「除增列敦煌寫經、佛像外，更有金石拓本、銅器、新會梁氏寄存碑帖、閩侯何氏寄存古器物等。書籍方面，多出明以上善本頗多，懸想是當日南運之時裝箱匆促所致」，黃裳以為周氏此舉，堪與周氏淪陷時期保護

⁹³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下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1394。

⁹⁴ 北京圖書館編：《國立北京圖書館由滬運回中文書籍金石拓本輿圖分類清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43年），「序」，頁1。

北大校產的「功業」等同視之。⁹⁵ 從周作人對圖書的保護，也可以看出他對古籍和金石書目的重視，這裡面也有周作人對金石、書畫的情緣在吧。

六、結語：周作人的「文類雜糅」與復古的意義

迄至目前為止，由文學出身者領銜的周作人研究，不少成果擴展至其文化和思想。然而，晚清、民國一代的知識人，本身就具有文類雜糅的素養，用長久以來形成的學科壁壘分明的某一種學科框架結構來闡釋的局限性，顯而易見；也因此，周作人訪碑、校碑、藏鑑金石拓片、接受考古發現新材料而改變的書風等等的研究，始終沒有進入文學研究者的視野。周作人與晚明的關係雖然受到了關注，但是與碑學系譜的關聯卻罕有論述。如果把周作人從學術空間中某個確定的經緯度上拿下來，以跨文化闡釋為路徑，將周作人研究從標籤移向更為深入的個案，或許可以重建對他的另一種詮釋。本論文通過梳理周作人所處時代的考古、美術、人類學、文學等不同學科的密切互動，以及跟隨他的留學路徑所發生的中日知識間的環流，從碑學系譜入手，來對周作人的審美觀念的原境（contexts）進行重構和闡釋，對周氏與晚明的親和關係在碑學脈絡中加以重組，並且對其文章與言行的互涉性加以解析，我們可以發現其理性之光、人情物理的特徵、美學觀念形成的源流。晚清、近代以來，由於西方人和日本人參與了中國的考古活動、美術史的撰寫，從而使得中國知識人擴大了對視覺藝術的理解，從原來的書法、繪畫，擴展到了金石學領域和 20 世紀重大發現的西北簡牘和敦煌經卷。重構歷史情境的意義在於：它首先提示，在對周作人及其同時代學人的研究過程中，務必建立多元的、流動的視角，打破文類範疇，周作人研究也可以使用非文字性材料，包括書

⁹⁵ 黃裳：《來燕榭文存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頁 203。

法、拓片等視覺材料；其次，在尋找周氏人文理性品格形成的同時，筆者再一次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狀態構建的複雜。直到北平淪陷之前，周作人閱讀晚明文人，尤為重視他們的氣節，並且化為自身建構地方性知識的情感出發點。1927年，談及王國維之死，周作人說：「學者其以此為鑑：治學術藝文者須一依自己的本性，堅持勇往，勿涉及政治的意見而改其趨向，終成為二重的生活，身心分裂，趨於毀滅，是為至要也。」⁹⁶可是半生以晚明文人氣節做底子的周作人，最終仍然選擇了與日本人合作，本文的探討不僅沒有解開這個謎，反而似乎加重了謎團；再次，周作人的一生都選擇了與他同時代人不同的對歷史、對時代的態度，他既是個眼光超前的思想家，也是個不停回頭看的復古主義者。

周作人及其同時代人，幼年時代接受的是傳統教養，即便在留學時代，他以及周邊友人也問學章太炎，同時通過日本的讀書界接受國內傳統學問的影響。掌握了英語、日語、希臘語的周作人，從紹興的地方教育官員，到北平淪陷下偽政府的教育總署督辦，在每一個時期都始終回看傳統；但他所（願意）接受的，又是傳統中非正統、反正統的成分，這些成分固然與周氏所受的西學的衝擊不可分，也與清季以來，益昌的考古學、考據學所帶動的碑學的興起直接相關。從歷史的縱軸上看，把他放在清季以來浙地樸學／考古學／金石學的系譜中，周氏兄弟對金石學興趣的發生並不特別和罕見。在宣布廢除一切傳統束縛、重估一切價值的「五四」熱浪中，考古學／金石學之所以能夠興盛，在於中國傳統學問和藝術領域借助新的技術、材料，通過追溯源頭，達到了革新的目的，故而在書法、國畫、篆刻等領域迎來了有別於其他傳統領域的「並非衰落的百年」。⁹⁷從歷史橫軸來看，

⁹⁶ 周作人：〈王靜庵君之死〉，收於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頁233。

⁹⁷ 萬青力：《並非衰落的百年：19世紀中國繪畫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留學時代起，周作人周圍就有學問旨趣相似、性情相投的朋儕，彼此間共同分享「精神貨幣」，其中碑學、金石之學的著述資料、從鼎彝之器延展到印章、瓦甓、封泥等金石實物，是相互流通的要項，他們對之探討研究、收藏和轉化它的固有形態，始終保持與傳統對話，來對自己的思維和思想進行操練，增加了他們學問的深度和廣度，使得這一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在學問上不做架空之說；「精神貨幣」的流通也成爲他們闡發理性、智識和改造現實的工具，並且化作各自的藝術修養，更成爲行走坐臥之間的日常風雅之物。周氏在不斷回頭的閱讀史中，呈現出去應用化、去價值化、去道德化的特質；同時，又有效地將相關知識加以創造性轉化（如建構地方性知識、推動古蹟保護等等），最大限度地實踐了他淪陷時期所強調「道義必須見諸事功，才有價值」的理念；⁹⁸ 同時，也展現了其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複雜面（比如他的落水問題）。他及其朋儕的生命歷程和狀態，帶給筆者的啟示或曰思考，仍然是「古」、「今」的問題；在對待古今問題的基本態度上，筆者以爲黃賓虹（1865-1955）在五四運動前夕所說的一句話最具有原理性：「善因者深明其守，而善變者會觀其通」；⁹⁹ 這是藉由復古主義順利因應現實的民國美術界，留給整個中國文化界的智慧，如何「善因」，怎樣「善變」，也是未完成的「五四」，逼著我們去思考接下來要走的路。

⁹⁸ 周作人：〈道義之事功化〉（1945），收於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頁628。

⁹⁹ 鄭工：《演進與運動：中國美術的現代化（1875-1976）》（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2年），頁148。

附錄一：周作人 1915 年金石活動

- 3月9日 集……武梁祠石刻1枚。
- 3月11日 在倉橋買跳山建初摩崖〈妙相寺石佛背銘〉共5紙，當寄北京。
- 3月12日 寄北京拓本1包：建初摩崖四石佛、二武梁石室一共7份。
- 3月13日 寄北京拓本1包。
- 3月22日 下午檢理，計古泉52枚、《兩浙金石志》、《陶集》等書畫共314部、175冊、拓本3種14枚。
- 3月30日 檢《兩浙金石志》等書，作〈集俎〉3則。
- 3月31日 理石經拓本，計216扇，缺《爾雅》、《左傳》各1扇，又明刻《孟子》17扇，經文補缺2疊，未計數。
- 4月5日 下午同重久往大街……又得石佛背銘2張。
- 4月8日 往大街得……〈大吉碑〉、〈石佛銘〉各2份。
- 4月9日 寄北京拓本1包。
- 4月13日 集4本金石。
- 4月15日 訪王晴陽，因云有《越中金石記》，不值。
- 5月6日 在倉橋街碑店問〈三老碑〉，云有1枚已售予徐氏，約1元，因得〈景龍宮鐘銘〉1枚朱拓，有長安縣印，云可禳火災。
- 5月10日 在景仁堂得鄉〈窆石〉拓本1份，又〈岫巖碑〉、〈漢石經〉殘字翻本各1份。
- 5月11日 在景仁堂得〈縉雲城隍廟碑〉（李陽冰篆，俗稱〈定風碑〉，龍瑞宮記并題跋）、〈祇園寺塔基記舍利塔銘〉各1份，又〈隋大興國寺舍利塔銘〉1紙……至長橋，出倉橋街，問〈三老碑〉，不可得。
- 5月12日 閱《兩浙金石誌》，計越中宋以前石刻止16種。
- 5月13日 下午理舊碑。

- 5月14日 上午由大街歸，得李陽冰〈黃帝祠字碑〉、巖山〈董昌生祠〉題記各1枚。
- 5月15日 閱《金石圖說》。
- 5月16日 在墨潤堂買《千壁風亭古專圖釋》1部4本，2元半。
- 5月17日 在馬五橋小店得殘磚1，文曰「鳳皇三年七」，下缺；又1磚完好無文，但作泉紋。下午拓鳳凰磚文2紙，蓋吳時物，因古磚圖稷飲酒、食羅漢豆。
- 5月19日 借香南精舍《金石契》2本，下午閱了。
- 5月20日 在景仁堂得〈甘泉山漢刻〉殘石拓本2紙，〈佛隴禪林寺唐施田刻石〉拓本2紙，過小坊口看古磚5，皆大紋無字……下午閱前書，得趙君銘。
- 5月25日 在墨潤堂得何竟山《雙鉤漢碑篆額》1部3本，洋7角2份。
- 5月26日 上午寄北京書1，夾《漢碑篆額》3本。
- 5月30日 閱《小蓬萊人閣金石文字》及石印原碑5種。
- 6月3日 在景仁堂得跳山摩崖2份、朱墨各1，較新拓本爲佳。
- 6月4日 閱唐石刻拓本及《兩浙金石誌》。
- 6月6日 晚閱《越中古刻九種》。
- 6月11日 在景仁堂又得朱拓〈跳山石刻〉1枚，在碑店得殘碑隸字4紙。上虞黃竹嶺〈蕭二將祠堂記〉1枚持歸。審視，似是太元2年或晉碑也，《兩浙金石志》未載。
- 6月15日 得北京10日寄書1包，內《百漢碑研》……下午訂《百漢碑研》，略閱，過前所得殘碑拓本，知是黃初刻，即《萃編》之13字殘碑也。
- 6月17日 上午閱《百漢碑研》。
- 6月19日 在景仁堂得原刻《金石契》2本。
- 6月20日 上午訂《金石契》，煥然一新，閱《千壁亭專錄》……晚又閱《金石契》與5卷本對校。
- 6月23日 得《雙鉤漢碑篆額》1部3本，在貫珠樓紅木店得漢磚2，

- 計洋 1 元令，爲上蠟約 28、29 取，文一曰「馬衛將作」，一曰「建寧元年八月十日作」，皆蕭山杭烏山物，光緒丙申出土，距今共 1748 年矣。歸後，飲酒，閱《漢碑篆額》1。
- 6 月 24 日 寄書 2 包，內《漢碑篆額》1，夾 3 本《越中金石記》，夾 8 本造像題字共 23 枚……晚閱《金石記》。
- 6 月 26 日 閱《金石契》，舊得 1 磚。
- 7 月 2 日 得北京 28 日寄書 1 包，內文始 1 本《求古精舍金石圖》，夾 4 本第四卷，錄磚文 20 餘，頗佳……晚閱《金石圖》。
- 7 月 3 日 下午閱《金石圖》了。
- 7 月 4 日 寄北京書 1 包，內《漢碑篆額》3 本……返登怪山，於塔下得斷磚 2，一云「塔專」，一云「護國禪師月江側」，文已殘，但存嘉信 2 塊、魁 5 字，攜歸……致中校四年生張孔修函，託求〈三老碑〉拓本。
- 7 月 7 日 徒步至廟下，訪禹寺往生碑廟，已爲人居，碑不可見。
- 7 月 8 日 上午拓「應天佛塔」磚 2 份。
- 7 月 12 日 閱《越中金石目》。
- 7 月 18 日 在國光社得《風雨樓藏石》6 種拓本……又 3 人同出，在蟬隱廬得《蒿里遺珍》1 冊、《再續寰宇訪碑錄》、《讀碑小箋》，……偶得《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各 1 本，皆羅振玉著。
- 7 月 23 日 寄北京書 1 包，內《再續寰宇訪碑錄》等 4 部、《風雨樓藏石》拓本 1 帖……下午拓磚文，曰「河平元年三月七日造」。
- 7 月 27 日 寄北京《漢沈君闕》拓本 1 枚。
- 7 月 28 日 閱《正倉院志》。
- 7 月 29 日 至倉橋街，見 1 磚，文「晉泰元廿一年」。
- 7 月 30 日 閱《求古精舍金石圖》及《金石契》。

- 8月2日 取北京29日寄書2包，內《續叢刻書目仿宋脈經》、《古專圖釋》、《漢碑篆額》各1部。
- 8月3日 泰元磚送來……購《秦金石刻辭》，又閱《蒿里遺珍》。
- 8月7日 閱《秦金石刻辭》，甚愜心目……文多有極精妙者。
- 8月18日 得北京14日函，並示陳師曾君仿磚文刻名印，曰「周作」，頗佳……又拓舊磚文2紙。
- 8月21日 寄北京函，附拓片4紙。
- 8月31日 上午往校，張生孔修持〈三老碑〉拓本來。
- 9月2日 寄北京小包1個，內《秦金石刻辭》、《蒿裡遺珍》各1本。
- 9月12日 寄北京格紙1包，1200枚，〈三老碑〉一枚。
- 9月15日 得〈往生碑〉拓本6枚，1元，系前屬拓者。
- 9月17日 寄北京函又書1包，內《符牌圖錄》1本、〈往生碑〉4紙……取北京5日寄小包2個……印3方，一曰「周建」，其二曰「周作」，皆陳師曾君所刻。
- 9月21日 寄北京函，附拓片2枚。
- 10月4日 在景仁堂得〈魯陽唐墓誌〉殘拓1、〈甘泉山獲石記〉及〈跋歌拓片〉3紙。
- 10月11日 取北京29日寄小包內……〈漢石刻〉拓本11枚、古泉3枚。
- 10月20日 閱秦漢瓦當文字，大悅心目。
- 11月5日 校墨潤堂交來《校碑隨筆》1部6本。
- 11月6日 晚閱《校碑隨筆》。
- 11月7日 下午閱《校碑隨筆》。
- 11月17日 寄北京函，磚拓2紙。
- 11月22日 去墨潤堂送《金石學錄》來，即還之。
- 12月12日 得……《越中金石目》，即《金石記》首卷……〈如願律師墓誌銘〉拓1枚。
- 12月20日 閱《越中金石目》。
- 12月31日 買〈景龍鍾銘〉拓本2紙。

附錄二：周作人 1916 年金石活動

- 1月1日 以〈景雲鐘銘〉及浮世繪條幅付裱。
- 1月8日 寄北京函又書1包，內《校碑隨筆》6本。
- 1月15日 寄北京函，附磚拓1紙。
- 1月22日 取裱件來，〈景雲鐘〉不佳，留置會中。買〈妙相寺石佛銘〉拓6枚。
- 1月23日 寄北京函，附〈石佛銘〉拓4枚。
- 2月2日 得北京29日函附……2本〈磁州墓誌〉拓片6枚。
- 2月6日 寄北京函，附永和磚全拓1枚。
- 2月22日 閱魏稼孫《續語堂碑錄》。
- 3月9日 祝先生云，新昌劉勰殘碑只2，數小石在寺僧處允為拓示。
- 3月19日 得北京15日寄書1包，公報3本、碑拓本8枚。
- 3月26日 訪梓生，還印存。
- 3月27日 閱《古代禮式與美術》。
- 5月7日 寄北京函，附拓1紙。下午又以連史拓2枚，似較煮礮為好。
- 5月21日 做〈蛻龕印存序〉，至午後了，370餘字，即交梓生。
- 5月26日 得北京21日函，附〈高進臣買地券〉元和9年拓本1枚。
- 7月3日 又得集拓片5枚，寄北京函，附去秦造像拓1紙。
- 7月6日 謝偉生君贈經幢拓本1份8面。
- 7月21日 在大路得梁大同殘磚1方……拓磚2紙。
- 7月22日 寄北京函，附磚拓1紙。
- 7月31日 寄北京函，附《虞海志》1枚、張普元《專志》1枚。
- 8月10日 得北京6日函又書1包，內《漢晉石刻墨影》、《歷代符牌圖錄》各1本。
- 8月16日 閱《考古學》。
- 9月3日 定刻印1方，約6日取。

- 9月5日 閱《漢晉石刻墨影》。
- 9月6日 取刻印來。
- 9月10日 寄北京函，又〈大吉碑〉等拓本1包。
- 9月13日 得石印《趙撝叔手札》2。
- 9月19日 定刻印2方，明日取。
- 9月30日 下午拓斷磚。
- 11月23日 在倉橋街得〈三老碑〉2枚1元，出校。
- 11月25日 還〈三老碑〉1枚。
- 12月7日 下午閱諸拓片、《高昌壁畫菁華》、《藝術叢編》等。
- 12月20日 下午閱墓誌拓本。
- 12月26日 閱《百漢碑硯》及《金石圖說》。
- 12月31日 拓2紙，但疑非真漢刻也。

附錄三：周作人 1917 年金石活動

- 2月6日 同往看塔，別無款識可導據之，舊有殘碑。
- 2月10日 至塘下金石佛寺，拓銘4紙。
- 2月17日 購〈跳山刻石〉拓本3份，又令全拓窆石8枚，付14角。
- 2月18日 往塘下金，又拓石佛銘8紙。
- 2月19日 寄北京函，得〈窆石〉拓本8枚，石甚佳。
- 2月22日 景仁堂裱匠來貼拓本題簽。
- 3月4日 至禹廟窆石題字。
- 3月18日 梓生同來，留宿，還《小說月報》等，又贈〈三老碑〉1紙。

徵引書目

- 《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魯迅手稿全集·日記》第1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 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
- 北京圖書館編：《國立北京圖書館由滬運回中文書籍金石拓本輿圖分類清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43年。
-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苦雨齋文叢：周作人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年。
- 白謙慎：《與古為徒和娟娟髮屋：關於書法經典問題的思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 朱希祖著，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羽田亨：〈景教經典志玄安樂經に就いて〉，《東洋學報》第18卷第1號，1929年8月，頁1-24。
- 羽田亨著，錢稻孫譯：〈景教經典志玄安樂經考論〉（節譯本），《清華周刊》第32卷第10期，1929年12月。
- 佐佐木佑記，程俊英譯：〈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在日本的接受和影響——以中村不折為中心〉，《中國書法》2019年第2期，頁73-78。
- 克利福德·格爾茨著，楊德睿譯：《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 克利福德·格爾茨著，韓莉譯：《文化的解釋》，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年。
- 沈尹默：《沈尹默書法論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 沈啟無：〈刻印小記〉，《人間世》第21期，1935年2月。
- 金鑑才主編：《中國印學年鑑1988-1992》，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3年。
- 知堂（周作人）：〈題永明三年磚硯〉，《藝風》第1卷第7期，1933年7月。
- 知堂（周作人）：〈奴俗與真率：關於傅青主〉，《宇宙風》第7期，1935年12月。
- 知堂（周作人）：〈老年〉，《北平晨報》「社會研究」，1935年12月20日。
- 知堂（周作人）：〈本色〉，《北平晨報》「社會研究」，1935年12月30日。
- 知堂（周作人）：〈關於家訓〉，《北平晨報》「社會研究」，1936年1月27日。
- 知堂（周作人）：〈談瘙癢〉，《朔風》第2期，1938年12月。
- 知堂（周作人）：〈辯解〉，《中國文藝》第2卷第5期，1940年7月。
- 周作人：《永日集》，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
- 周作人：《夜讀抄》，上海：北新書局，1934年。
- 周作人：〈談戒律〉，《青年界》第10卷第2期，1936年9月。
- 周作人：《立春以前》，上海：太平書局，1945年。
- 周作人：《風雨談》，上海：北新書局，1947年。
-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1971年。
- 周作人：〈錢玄同的復古與反復古〉，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94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頁98-117。
- 周作人：《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上、下冊，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
-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老虎橋雜詩》，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魯迅的故家》，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
- 周作人著，陳子善、張鐵榮編：《周作人集外文》上、下冊，海口：

- 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年。
- 周作人著，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6卷，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
- 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5、7-9、14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下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
- 柯柏森：〈偏見的經驗〉，《京報副刊》第79號，1925年3月。
- 夏曉靜：〈拓片上的記憶——魯迅和周作人的兄弟情〉，《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6期，頁79-84。
- 豈明（周作人）：〈文飯小品〉，《人間世》第9期，1934年8月。
-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 桑椹編：《歷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錄》第3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陳平原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
- 陳言（陳玲玲）：〈印章和書法裡的周作人書齋〉，《魯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10期，頁58-64、77。
- 陳言（陳玲玲）：〈周作人印章中的趣味、學問、交往和政治〉，《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1期，頁51-67。
- 梅松：《道在瓦甓：吳昌碩的古磚收藏與藝術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
- 梁啟超著，夏曉虹點校：《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常乃惠：《中國思想小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章太炎：〈論碑版法帖〉，《制言》第11期，1936年2月。
- 章太炎：〈答汪旭初論碑文書〉，《制言》第29期，1936年11月。
- 張菊香、張鐵榮編：《周作人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社，1986年。
- 傅山：《作字示兒孫》，收於葉朗主編：《中國歷代美學文庫：清代卷》上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 傅山：《家訓》，收於傅山著，尹協理主編：《傅山全書》第2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 傅山著，侯文正注解：《傅山論書畫》，太原：三晉出版社，2015年。
- 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東京：文求堂，1941年。
- 黃裳：《來燕榭文存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
- 錢玄同著，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中、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 楊守敬：《楊守敬評碑評帖記》，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 萬青力：《並非衰落的百年：19世紀中國繪畫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 鄭工：《演進與運動：中國美術的現代化（1875-1976）》，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2年。
- 魯迅：《熱風》，上海：北新書局，1925年。
- 魯迅著，張望編：《魯迅論美術》，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
- 劉半農：〈雙鳳凰磚齋小品文〉，《人間世》第1卷第1期，1934年4月。
- 劉半農：《半農談影》，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00年。
- 劉復（劉半農）：〈致吳立模書〉，《文學》第4版，1924年2月11日。
- 潘運告編注：《晚清書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年。
- 蕭振鳴：《魯迅的書法藝術》，桂林：灕江出版社，2014年。
- 鍾叔河：《偶然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3年。
- 藥堂（周作人）：〈漢文學的前途〉，《藝文雜誌》第1卷第3期，1943年9月。
- 羅振玉：《羅振玉自述》，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年。

顧隨著，顧之京、趙林濤、高獻紅主編：《顧隨全集》第9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

Burke, Kenneth. *Attitudes toward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